

■ 汉代是一个开放性较强的社会，西汉中期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之后，中西文化交流得以不断加强。在这种大背景下，合浦成为汉代这条海上交通线的桥头堡。风门岭及合浦汉墓出土的一大批与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物证，可以证实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在汉代的确存在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五章 五光十色的货物

面对至今仍占地球 70% 面积的、宝石般的湛蓝大海，很容易引起人们的遐想：大海的彼岸和深远处会有什么呢？会有仙山琼阁吗？也许有人会想到海中的美人鱼，有人会想到古希腊海域中会唱歌的水妖。大海有神奇的故事，有丰富的资源，在大海的彼岸还有丰富的宝藏。因此，航海者出海会带着不同的目的。渔民出海是渴望获得满仓的鲜鱼；探险家出海除有着某种特殊的目的外，或许还为了体验和玩味惊心动魄的致命刺激；航行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汉代中国商船则是为了用黄金和丝绸等中国物产去换取外国的玻璃、香料、象牙及其他各种奇珍异宝。

黄金及金银器

说起黄金，几乎无人不晓。千百年来，黄金一直被人们视为财富和高贵的象征。在希腊神话中，在阿拉伯的传奇故事中，在中国的民间传说中，都有关于黄金的生动故事。黄金的元素符号来自拉丁文 *Aurum* 一词，原意为“光辉灿烂的黎明”。在古罗马，*Aurora* 是黎明女神的名字；古埃及人把黄金视为太阳神的象征；而公元前 4 世纪的古希腊诗人品达罗斯，则把黄金描写为“宙斯的孩子”。在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对黄金的神奇魅力曾有这样的描述：“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这一点点，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这东西可以把你的祭司和仆从从你的身边拉走，把壮士的头颅底下的枕垫抽去。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它可以使受诅咒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癩病的人为

大众所敬爱；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即使她的尊容会使身染恶疮的人见了呕吐，有了这东西，也会恢复三春的娇艳。”

无论地域不同，种族差别，或者宗教信仰如何，人们都希望得到和拥有黄金。因此，黄金成为汉代海外贸易中的重要媒介物和货币。黄金是一种贵金属，化学结构较稳定，耐腐蚀，其制品埋藏土中千年亦色泽如新。

在中国，黄金作为货币形态，最迟在战国时就流通于楚国。战国时期的楚国金币称作“郢爰”或“爰金”、“钣爰”、“金钣”等。“郢”是楚国都城的名称，位于今湖北荆州古城北门外的纪南城。“爰”是古代的一种重量单位。金钣为扁平状，方形，上面打有一块一块的模印，四两见方，每一小块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它以重量定价值，是一种称量货币。因上边打有模印，俗称“印子金”。模印字为“郢爰”或“陈爰”。这种金钣使用时按印格切开，再称量，它在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省都有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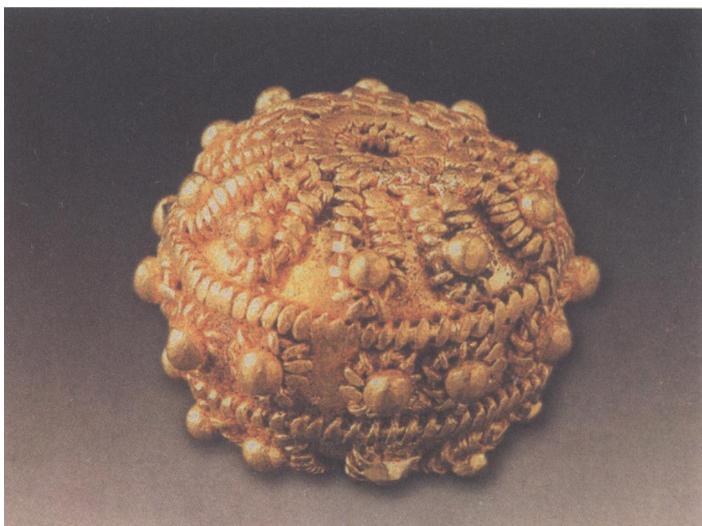


■这两枚是1971年合浦望牛岭一号汉墓出土的金饼，面径6.3~6.5厘米，重244.9~246.7克。

秦汉时，货币除使用铜钱外，也兼用黄金，黄金被称为上币，铜钱为下币。《汉书·食货志》称，黄金一斤值万钱。汉代一单位黄金的标准体积为一立方汉寸，重量为一汉斤。金币外形有圆饼形和蹄形两种。因汉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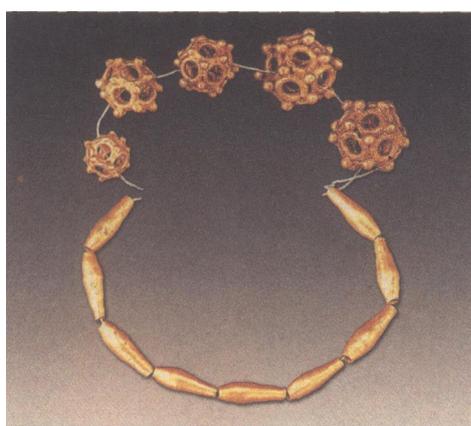
帝时，把黄金铸成麟趾形、马蹄形，故蹄形金币又有“麟趾金”和“马蹄金”之称。据统计，湖南、江苏、山西、河南、陕西、河北、安徽、广西等地都出土过汉代金饼，总数超过百枚。金饼分大小两种，大者一般重 250 克左右，即一汉斤。小者一般重 15~16 克，即一汉两。

广西目前发现过三枚金饼，其中合浦望牛岭汉墓出土了金饼两枚，均为圆形凹心。一枚直径 6.5 厘米，重 247 克，上面刻“阮”字，在阮字上方细刻一“位”字；另一枚直径为 6.3 厘米，重 249 克，上刻有一“大”字，在大字下方细刻“太史”二字。贵县罗泊湾二号墓出土金饼一枚，圆形，正面凹陷，背面隆起。正面竖刻“一××Ⅲ”符号，实重 239 克，直径 5.5 厘米。汉代黄金流通比较普遍，故当时商业使团带黄金出海作为支付手段，应是自然的事情。



■合浦风门岭 M10 出土的金花球，共两个。相似的金花球手饰在合浦北插江盐堆 M1 和 M4 中也出土了 8~14 个。造型大致为圆球形，也有其他形态，纹样也略有不同。据专家研究，其中的一些金花球的制作是先用圆形小金条焊成小圈，小圈与小圈互相焊接，并在其上焊接金珠堆叠成花饰。这种高温吹凝工艺技术来源于西方，古希腊可能是起源地。它大约沿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南海—合浦港传入。有人认为其造型有印度风格，可能是从印度输入。

有人认为古代东南亚商贸中，中国的铜钱也和黄金一样会流入东南亚区域，当地会把中国货币当做通货，极少回流中国。东南亚发现最早的中国钱币是西汉王莽时铸造的，其中包括“五十大钱”，此外还有东汉时期的“五铢”。不过，汉代的海外商贸更多的是以物易物和使用贵金属，铜钱的流入应不普遍。中国铜钱大量输入东南亚应是宋代以后。明代马欢在其《瀛涯胜览》中说：“番人殷富者甚多，买卖交易行使中国历代铜钱。”



■合浦盐堆 M4 出土的金串饰，除有金花球外，还有 9 个管状饰件。



■合浦盐堆 M1 出土的金串饰

在商贸活动中，中国商人会输出黄金以购物，同时也会输入外国精美的金、银器皿或饰物。两广汉墓不乏金、银器物出土，其中有本国制造的产品，也有海外输入的产品。广州西汉南越王墓曾出土一种金花泡饰，呈半球状，泡壁极薄，泡里在底口稍下处焊接一根横梁，以作连缀。球面形

的泡体上有九组图案，都以金丝和小金珠焊接而成。这种焊接工艺与中国传统的金银细工不同，而与西方出土的多面金珠上的焊接相同，因此被认为是海外输入品。相类似的金花球在合浦汉墓也有出土，如 1978 年合浦环城乡北插江盐堆一号墓出土有金手链、金花球一串共 20 枚，其中金手链珠 14 枚，有 10 枚是橄榄核形，有 4 枚是棒槌形，均穿孔；金花球 6 枚，多边形球体，外缘有粘珠。1986 年合浦风门岭十号墓又出土金花球 2 枚，1995 年在北插江四号墓出土金花球 14 枚，形制与盐堆一号墓的相似。它们也应是从海外输入的。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银盒。盒盖及腹处有交错的蒜头形凸纹，这是用模子压着精心锤揲而成。盖与身相合处上下边缘各饰一匝溜金穗状纹带。据研究，银盒的造型、纹饰与中国汉代的金银器迥异，但在西亚古波斯帝国时期的金银器中不难找到与之相似的样本，因此很可能是从海外输入的。而盒的圈足及盖上的凸纽座是后加上去的。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也曾出土过一件带盖的扁球形银圆盒，通高 12.1 厘米，腹径 14.8 厘米，重 272.6 克，盖与器身吻合，盖与器身均施有突

蒜瓣形主纹带，是典型的波斯纹饰。盖沿和器沿各饰有一条穗状窄纹带，表面镏金，上有汉字铭文，乃是后刻的。此银盒与伊朗苏撒城所出土的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于公元前5世纪所制刻有波斯王薛西斯的名字的银器类似。它很可能是古波斯帝国的器物。

华美丝缛

在早期的中西方商贸中，中国对外输出的大宗货物是纺织品，而纺织品中，最受西方人欢迎的是丝绸和丝绸织物。

两汉时期，中国丝绸主要通过三条商贸通道运往西方和东南亚各国：

一条是因为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后而著称于世。此道东面的起点是西汉的首都长安（今西安）或东汉的首都洛阳，西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越罗布泊地区的楼兰古国，再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安息（今伊朗），最远到达大秦（罗马帝国东部）的犁轩（又称黎轩，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或西南行，到达巴基斯坦、阿富汗喀布尔，转海路也可以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

一条是鲜为人知的“西南丝绸之路”。它由四川经云南过伊洛瓦底江，至缅甸北部的孟拱，再渡亲敦江到达印度东北的莫帕尔，然后，沿恒河流域转入印度西北，至伊朗高原。这条丝绸之路比陆上丝绸之路还要早得多。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广汉市发现了神秘的三星堆遗址，距今三千多年，遗址出土了一批与西亚和希腊文化相关联的文物。其中，有长1.42米的金枝、高约4米的“神树”和大小不等的铜人、铜头、铜面具等，专家们认为这些文物很可能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时传人的。

还有一条即为南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因汉武帝正式派遣官方商船出航而著称于世。中国海船从合浦、徐闻等港口出发，途经今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缅甸，远航到黄支国（今印度建志补罗），然后从斯里兰卡返航。从文献记载看，已程不国是西汉时中国航海家所达到的最远点。中国丝绸进入印度，可以先转运到巴利柴格（今布罗奇港）和巴巴里肯（今卡拉奇附近），再从这两个港口向北与中亚陆上丝绸之路相通；向西经阿拉伯海、波斯湾、幼发拉底河与叙利亚、巴勒斯坦商路相通，再经地中海航运至罗马。从印度还可以绕过阿拉伯半岛，经红海进入埃及亚历山大里亚港，再经地中海到罗马。当陆上丝绸之路受阻时，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就更显出其重要性了。

其实，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国丝绸就已经大量转运到了西方世界。在古代罗马，用产自中国的丝绸制作的服装成为当时贵族们高雅时髦的装束。因为来自遥远的东方，所以造价昂贵。罗马为了进口丝绸，流失了大量黄金。我们今天在雅典卫城帕提侬神庙的女神像身上，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博物馆收藏的酒神巴克科斯的女祭司像上，都可以看到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人们所穿着的丝绸服装，轻柔飘逸，美丽动人。罗马人对丝绸服装的追求已经到了奢侈浪费和伤风败俗的地步，使得罗马元老院多次下令，禁止穿用丝织服装，但并没有起多大作用。

罗马帝国的古典作家们把产丝之国称之为“赛里斯”（Seres）。公元1世纪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在《博物志》中说：“（赛里斯）林中产丝，驰名字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到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赛里斯”就是中国，

这就是当时丝绸远销罗马的真实写照。老普林尼和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的西方学者，并不清楚丝绸是如何织成的。中国的养蚕和缫丝的技术是很晚才传到西方的。唐朝初年西行取经的僧人玄奘，在公元 644 年回国途经于阗（今和田）时，听到一则传说，在现存的关于于阗佛教史的藏文文献中也有大同小异的记载。这个故事的主要情节是讲于阗王曾娶东国（一本作中国）女为王后，暗中要求对方将蚕种带来。新娘下嫁时，偷偷把桑蚕种子藏在帽絮中，骗过了关防，把养蚕制丝的方法传到了于阗。从此以后，于阗“桑树连荫”，可以自制丝绸了。于阗国王为此特别建立了麻射僧伽蓝以为纪念。近代考古学者曾在和田东北沙漠深处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一块 8 世纪的木版画，上面描绘一位中国公主带着一顶大帽子，一个侍女正用手指着它。研究者认为，这里所画的正是那位传播养蚕制丝方法的丝绸女神。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盆地的古墓中，发掘出大批高昌国时代的汉文文书，证明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各绿洲王国生产的丝织品的情况。

中国的丝绸运往西方各国，往往经过几次转手贩运，陆路是经大夏、粟特、安息商人之手，而海路亦需借助东南亚、印度、安息商贾之力。安息曾控制过中亚和西亚，垄断了丝绸之路的中转贸易，从过境贸易和出口贸易中获利丰厚，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获利达数倍之多。中国丝绸运抵罗马时，价格十分昂贵，它的价格几乎等同于重量相等的黄金。为寻找一条能直接与中国进行贸易的通道，罗马人到达了印度，在发现印度洋水道后继续东进，他们孜孜不倦的努力和追求终于有了结果。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 年），大秦（罗马）国王安敦遣使自越

南向中国皇帝进贡象牙、犀角之类的物品，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位罗马私商假借出使之名罢了。无论如何，这都是罗马和中国之间的首次海上交往的真实记录。此后，中国与罗马帝国一直保持有联系，据记载，黄武五年（226年）吴国孙权在位时，大秦商人秦论来到交趾，并随交趾太守的使者到达孙权朝廷。

据《汉书·地理志》说，当时中国商船带出的货物除“黄金”外，主要就是“杂缯”了。所谓“杂缯”，其实就是汉代丝织物的总称。缯亦称帛，或合称缯帛。

现代汉字	甲骨文	释义
蚕		一条蚕虫的形状
桑		树叶丛生的桑树
丝		将丝束起，两端像束起的余绪
裘		外有兽毛的衣服
衣		“人”为衣领，“巾”为衣的两襟。

■ 甲骨文“桑”，“蚕”等字。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缫丝和织绸的国家。公元前16世纪商朝的甲骨文字中已有“桑”、“蚕”，“丝”、“帛”等文字，从侧面证实当时工匠已掌握了这一系列的工艺技术。

已有足够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1926年在山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半个被切割过的蚕茧，茧长15.2厘米，幅宽7.1厘米，说明五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知道利用蚕茧。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一批经纬密度为48根/厘米的丝织品，表明当时的丝织技术水平已较高。在商代，不仅从已识读的甲骨文中发现有桑、蚕、丝、帛等文字，而且从河南安阳

出土的铜钺上找到了绢、缣和雷纹绮的痕迹。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把商代青玉戈上也发现了雷纹条花绮的印迹。这种花绮是由平纹织地四枚异向纬斜纹织花。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织花丝绸了。



■这是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件素纱单衣。衣服虽然宽大，但它的重量才 48 克，还不到一两重，如此轻薄的实用纺织物连用现代的高超的纺织技术也难以织成。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印花敷彩纱，色彩鲜活，构图流畅，反映了当时精湛的印花工艺。

发展到了汉代，丝织物不仅种类很多，而且相当精美。常见的丝织物因织法或制作工艺的不同，则有缟、素、绡、练、绢、缣、纱、绮、锦等名称。一般而言，平织无纹的绢、缣等，织造技术比较简单，有纹彩的绮、锦等，织造技术较复杂。有些织物上面还用针绣出各种精美图案，费时费

工，更加珍贵。《西京杂记》提到织绶，“六十日成一匹”，可见织造高级织物多么耗时费工。

丝织物的价格较昂贵，《九章算术》卷三提到，“素一匹一丈价值六百二十五”；《初学记》卷二七曰：“绣细文出齐，上价匹二万，中万，下五千也。”这些珍贵的丝织物，博得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喜爱，故成为当时中国海外输出货物之大宗。此外，自蜀、滇、夜郎运来的蜀布、蜀锦和岭南生产的麻织物、葛织物也可能是输出海外的货物。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就曾出土过麻布的残片。广州西汉南越王墓曾出土了印花铜模板，这是一种织物印花模具。同时出土的丝织物残片中有绢、罗、纱、锦、绮等。其中灰白色的火炬形花纹，与印花铜模板的图案一样，当中还有目前在其他地方没有见过的超细绢、黑油绢、绣纱等，可见当时包括广西在内的岭南地区已具有较高的纺织、印染技术，这为海外丝绸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

晶莹宝石

从20世纪50年代起，随着较多的各种质料的宝石装饰在两广汉代墓穴中发掘出土，考古学家开始思考这些宝石装饰品的产地了。这些宝石饰物是在岭南自己加工的吗？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在岭南发现相应的加工工具及加工场的遗迹。是从中原地区输入岭南的吗？然而在中原地区的汉墓或遗址中这类宝石饰物仍不多见。相反，有些学者发现一些宝石饰物的加工技术特征和形态与东南亚或西方国家的有较密切的联系，因此更多的学者认为虽然不排除有些宝石饰物有属本地的可能，但绝大多数应是从海外输入的。而且，大量的输入当在汉武帝派遣的商船出海开通南海航线以后。

宝石是自然界的骄子，它以瑰丽多彩、晶莹无瑕、璀璨夺目而使人爱不释手，给人以美的享受。古罗马作家普林尼说：“在宝石微小的空间，它包含了整个大自然，仅一颗宝石，就足以表达天地万物之优美！”自古以来，宝石就得到人类的宠爱。然而什么是宝石呢？狭义的宝石是指符合工艺加工要求的天然矿物单晶体，即红宝石、祖母绿、黄玉、紫晶等。广义的宝石是泛指那种经过琢磨和抛光后，可达到珠宝要求的石料或矿物。两广汉墓出土的各种宝石饰物大致属于广义的范畴。对宝石分类各国有不同的标准，有些中国宝石专家习惯上把宝石分为宝石、玉石、有机宝石、人造宝石四大类。

人类制造玉石饰品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已会制作石质串珠。到了新石器时代，已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玉器工艺品的生产，如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种类之多，工艺之精美，令世人惊叹不已。岭南越人对玉石质料的认识同样较早。1964年，广西隆安乔建新石器时代遗址就发现过一件精致的玉铲，它是用青玉精磨而成，器身扁平、束腰、短柄、双肩，刃部锋利，颜色碧绿圆润，是一件既可使用又可赏玩的工艺品。到了汉代，人们对玉石的喜好有增无减。岭南出土的汉代玉器种类和数量都较多，从色泽而言，有白玉、翠青玉、翠绿玉、黄褐色玉、红褐色玉等；从器型而言，有镯、环、块、杯、印章、璧、动物塑像等。

除了玉制品外，在两广汉墓中，经常发现有采用玛瑙、鸡血石、水晶、琥珀、琉璃等材料制成的雕饰、串饰等装饰品和一些小型器件，从质地及工艺看，这些制品并非全是自产，其多数当从海外输入。



■带钩是一种束勒、系结腰带的器物。汉代带钩有用铜、银、金、玉等质料制成，形态亦丰富多彩。合浦环城乡黄泥岗出土的子母带钩是用青玉精雕而成，十分珍贵。



■汉代的玉器工艺已十分成熟，玉器的种类有祭器、配饰，实用器和艺术品等。左图是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谷纹玉杯，迄今为止是全广西唯一一件。从外形而言，它可作容器，但由于极为珍贵罕见，所以实际是被当做陈设品。



■合浦环城乡黄泥岗一号墓出土的蝉形玉玲，长6.2厘米，宽2.9厘米，以一种简约而明快的线条在一块质细、米黄色的玉上所雕成。古人相信玉有灵性，或能使尸体不腐，形如蝉状的玉玲置放在死者口中，寓意死者能像蝉那样，入土复出，脱壳重生。



■对玉石的审美情趣在原始社会便已经产生。大自然中的一些石头质地细腻，色泽透明、圆润而令人喜爱这是广西隆安乔建出土的一件新石器时代玉铲，它工艺精致，颜色碧绿，十分美观。

有人曾对 20 世纪 90 年代前所发掘的广西汉墓出土的玛瑙、水晶、琥珀装饰品数量进行过统计：共出土了玛瑙珠 220 粒，缠丝玛瑙珠 12 粒，苔丝玛瑙珠 17 粒，肉红石髓珠 88 粒，另有玛瑙环 2 件，玛瑙耳珰 5 件，玛瑙耳塞 2 件，玛瑙扣 16 件，玛瑙戒指 1 枚，玛瑙盘龙饰 1 件，肉红石

髓雕狮 6 件，肉红石髓雕鹅 5 件；有水晶珠 100 多粒；琥珀珠 250 多粒，琥珀小动物雕饰 2 件，琥珀雕狮 3 件，琥珀印章 3 枚，琥珀指环 1 枚等。



■水晶是一种天然矿物，以透明、无瑕的光泽而令人悦目。广西汉墓出土的珠饰中，有不少是水晶制成的。这是 1990 年合浦环城乡黄泥岗一号墓出土的三色水晶串珠，有黄，纯透明，浅蓝三色。水晶珠中钻有小孔，可用线穿连成串。水晶硬度为 7，在中间钻出如此小孔，加工难度很高。



■合浦黄泥岗一号墓出土的紫水晶串珠，最大粒直径 1.8 厘米，最小的 1 厘米。水晶家族中以紫水晶最为珍贵，颜色从淡紫至深紫，以深紫色为优质品。直到今天，紫水晶制成的饰物和工艺品仍深受人们喜爱。

广州西汉中期后汉墓，也有较多的各种质地的珠饰、雕饰品出土，如广州龙生岗一座东汉初期墓就发现有硬玉、玛瑙、水晶等质料的珠饰 100 多件。仅对《广州汉墓》一书所录汉墓出土的玛瑙、水晶、琥珀等质料装饰品数量进行大致统计，约有玛瑙制品 360 件（粒）、水晶制品 89 件（粒）、琥珀制品 33 件（粒）。



■玛瑙也是一种能制作饰物、工艺品的天然矿产。这是合浦堂排二号墓出土的红花玛瑙穿珠，其色彩富丽，光泽可人。古文献有大秦，西南诸国多玛瑙的记载，说明它们有可能自海外输入。

玛瑙是一种矿物，主要化学成分为二氧化硅(SiO_2)，色泽莹润，质硬细致，是制作装饰品的优质材料。出土的玛瑙制品种类主要有串珠、坠、耳珰、印等。玛瑙串珠的形态较丰富，主要有圆形、扁球形、管形、橄榄形、菱形、算珠形、狮形等，颜色多为橘红色，也有棕色、淡黄色、白色等，亦有玛瑙串珠为白色爽青色丝斑，或黑白相间，或浅棕夹乳白纹带，十分美观。汉晋以后的文献有称：玛瑙“出自西域，文理交错，有似马脑，故其方人因以名之”。《广志》曰：“马瑙出西南诸国。”《魏略》曰：“大秦多马瑙。”上述记载说明西域、大秦、西南诸国均为盛产玛瑙之地，由于输入中国的玛瑙及其制品颇受当时人们喜好而著称于世。因此，虽然不排除云南的玛瑙有输入岭南的可能，但两广汉墓出土的玛瑙饰物，多数

应是从海外输入的。



■这是合浦堂排汉墓出土的动物小穿坠，有小鹤、小狮等形态，雕工精致，十分可爱。



■合浦风门岭出土的玛瑙狮饰物。狮子产于印度、斯里兰卡、非洲等，因此狮状饰物应自海外输入。



■合浦堂排汉墓出土的琥珀饰物，有圆纽形、扇形、蛙形等。琥珀是由植物树脂经高温、高压形成的一种有树脂光泽的有机物，可制成首饰与工艺品。

琥珀是一种由碳、氢、氧组成的有机物，由植物树脂经石化而成，透明，树脂光泽，色蜡黄至红褐，可制装饰工艺品，亦可入药。两广汉墓出土的琥珀制品常见类型有串珠、配饰、耳珰、指环及明器琥珀印章。琥珀

产自欧洲和东南亚地区，我国的云南也有出产，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可知当时大秦（罗马）也是琥珀的产地。但“云南石寨山和李家山两处汉墓群都不见有琥珀出土，所以广州、贵县的琥珀串饰不会来自云南”。广西合浦堂排汉墓出土有用琥珀圆雕的小狮子，而狮子的产地只是印度、斯里兰卡、欧洲东南部、非洲等，因此应视为海外输入的物品。广西合浦堂排汉墓也曾出土过琥珀印章两枚，一枚为半球形，上刻“王以明印”；另一枚为正方形，蛇纽，边长 2.3 厘米、高 2.1 厘米，上刻“劳邑执圭”四字。据专家考证，“劳邑执圭”印乃是明器，应是仿汉代官印所制，约在“西汉中期晚段，‘劳邑执圭’持有者老矣，死时刻此琥珀明器印下葬”。据此可知，海外输入的不仅有琥珀制品，还有琥珀原材料。

七彩玻璃

说起玻璃，对于现代人来说，几乎是无人不知的。在日常生活中，几乎处处都可以看见用玻璃制造而成的物品：门窗上的玻璃，喝水用的各种式样的玻璃杯，装汽水或酒的各种玻璃瓶，墙上挂着奖状的玻璃镜框，桌上插着鲜花的玻璃花瓶，还有小朋友们玩的五颜六色的玻璃球，真是不胜枚举。无色透明的玻璃球，经过高温加工制成的玻璃纤维，在工业中用途是非常广泛的。玻璃仪器也是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的不可缺少的设备。总之，玻璃制品以其晶莹透明、色彩艳丽、耐腐蚀和价廉物美等特质而赢得人们的喜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以及生产的重要器材之一。

玻璃制造术是古代人类继制陶术发明以后的又一伟大的创造，世上本来并没有玻璃这种物质，是人类通过化学变化将一种物质改变成另一种物

质的新创造。或许这种发明是来自一种偶然、一次意外，但晶莹透明的、从未见过的新物质的诞生无疑会令人惊奇、兴奋甚至自豪，于是世上流传着各种各样关于制造玻璃的动人传说。

在西方有关于腓尼基人发明玻璃的传说。三千多年前，一艘满载大块天然苏打（碳酸钙）的商船停泊在地中海沿岸贝鲁斯河口的美丽沙滩上。腓尼基船员在河滩上用天然苏打块支锅野餐。饭后，当他们收拾东西时，在炉的灰烬中发现了一种玲珑剔透、晶莹闪光的东西。原来，这沙滩上都是石英砂，在船员们烧火做饭的时候，支着锅的天然苏打在高温下和石英砂发生了化学反应，因此变成玻璃了。聪明的腓尼基人在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秘密。当秘密被发现以后，就开始了玻璃的生产。腓尼基人用特制的炉子，把石英砂和苏打一起熔化，炼出玻璃液。最初，他们把玻璃液制成大大小小的玻璃球、玻璃珠子，运往世界各地。由于人们从来没见过这样圆溜溜光闪闪的透亮珠子，都把这些玻璃珠看成宝贝，因此用黄金或珠宝来换，腓尼基人由此发了大财。不久，腓尼基人制造玻璃的秘密便被人泄露出去了。

但是古埃及也有自己发明玻璃的动人故事。古埃及是个文明古国，远在公元前四千年，古埃及人就已经开始探索天空，他们发现了天狼星在早晨的出现和尼罗河泛滥的关系。在三千五百年前，还没有风箱，他们就能用吹管吹旺熔炉，冶铸金属器皿。而相传早在五六千年前，古埃及人就发现了玻璃。据说，是一位制造陶器的工匠，在一次从窑中取出陶盆时，看到陶盆里有一块亮晶晶的东西。这位聪明而细心的工匠没有放过这个小小的意外的晶体，他分析陶土里的成分，一次次试验烧制，终于搞清了这亮